

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以蔣渭水〈入獄日記〉中《西鄉南洲傳》 為中心

吳佩珍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台灣的民族獨立運動由武力走向文化啟蒙、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形式是在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武力抗日運動「西來庵事件」(1915~1916)之後。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治警事件」時，重要的領導人物之一蔣渭水在被捕入獄當天的日記中記述：「必是全島行一網打盡的手段了，一定是台灣的獅子(志士)狩了」。蔣渭水此一形容其實正道出明治維新運動以及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權運動的激進派志士思想行動對蔣渭水的影響力。但在先行研究當中，關於蔣渭水對於日本文學的涉獵以及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的思潮如何對其產生影響，可說是從來無人提及。

蔣渭水〈入獄日記〉也是他所留下來極少數的讀書日記，其中包括了日本文學作品。蔣渭水所閱讀之文學作品，包括再三提及的《西鄉南洲傳》等政治講談本均為與日本明治初期自由民權運動背景有關或是其相關的延伸作品。

2007年3月27日投稿；2007年5月20日審查通過；2007年12月2日修訂稿收件。

* 二位審查人對本文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以及指正，讓筆者受益良多，特此致謝。

蔣渭水因「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被捕入獄時，正值大正十二至十三年間，為何明治維新時期思潮以及明治一〇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的記述會再現於蔣渭水此時的〈入獄日記〉呢？本文將由蔣渭水閱讀的《西鄉南洲傳》版本探究此文本與日本民權運動的關係，進而以蔣渭水書中所記錄的西南戰役中熊本協同隊為中心，探討以西鄉南洲主導的西南戰役前後，宮崎八郎的動向與其自由民權主張，之後將進一步釐清大正一〇年代所出現的明治維新時期思潮和自由民權運動，以及二者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由民權運動、蔣渭水、〈入獄日記〉、
日本近代文學、台日比較文學

**The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in Japan and the Inaugurating National
Diet Movement in Colonial Taiwan: Along
*the Biography of Saigo Nanshu in Jiang
Wei-Sui's Diary in Jail***

Wu Pei-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hoochow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urning point of Taiwan's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colonial period from armed resistance to non-armed resistance is the Ta-pa-ni Incident, the last great armed revolution resisting Japanese colonial ruling from 1915 to 1916. Afterward the Inaugurating National Diet Movement in colonial Taiwan began as non-armed resistance movement against the Japanese ruling power.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aders in the Inaugurating National Diet Movement is Jiang Wei-Sui who was arrested in June 6th 1923 when Taiwan's government-general decided to exercise the strict control over the movement. He described his impressions in his diary at the day he was arrested: "This is must be the beginning of a crackdown, Taiwan's Lion (Shi-shi) hunting just begins." Jiang's

description reflects how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radical activists' thoughts from both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the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Jiang Wei-Sui's *Diary in Jail* includes his few reading records, such as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Biography of Saigo Nanshu*, ect. Most these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are based on the stories of the activities in the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early Meiji or related with this movement.

Through examining the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indicating at Jiang's *Diary in Jail*, we will have a clear picture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augurating National Diet Movement in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f moder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I hope this paper will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augurating National Diet Movement in colonial Taiwan and how the Freedom and the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in Meiji period influences Jiang.

Key words : the Inaugurating National Diet Movement in colonial Taiwan,
the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Jiang Wei-Sui,
Diary in Jail,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與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以蔣渭水〈入獄日記〉中《西鄉南洲傳》為中心¹

日本領台以來，武裝抗日運動不斷蜂起，被視為漢民族最後最大規模的武力蜂起為一九一五年所發生的「西來庵事件」。之後的抗日運動由武力抗爭轉變成為社會運動路線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九二三年台灣總督府對於議會設立運動決定展開全島取締，而此次的取締行動，蔣渭水稱之為「獅子狩（志士狩）」²，甚至寫成〈台灣獅子狩〉一文。³其中獅子一詞與日文「志士」諧音，源自日本幕末「勤皇志士」。從日本幕末「勤皇志士」的行動樣式來解釋，志士被認為是「為超越個我的共同幻影而犧牲名利榮達，其本質在於須覺悟即使犧牲也無法獲得世間評價」⁴的憂國憂民者。蔣渭水的〈入獄日記〉著墨甚多的宮崎八郎以及其弟宮崎滔天，從上述定義來看便被歸類為志士。而蔣渭水在入獄當天的日記中記述：「必是全島行一網打盡的手段了，一定是台灣的獅子（志士）」

¹ 本文為執行 95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蔣渭水〈入獄日記〉中《西鄉南洲傳》為中心〉之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編號 NSC95-2411-H-013-22。

² 對於刑事以及檢察官到宅搜捕行動，司法警察分班開訊，蔣渭水始察覺「是關係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事件，我直覺這不但是台北的，必是全島行一網打盡的手段了，一定是台灣的志士（獅子）狩了」，〈入獄日記（一）〉，《台灣民報》2 卷 6 號（1924 年 4 月 11 日）。

³ 1924 年 12 月 17 日日記中：「脫稿台灣之獅子狩一編」，見〈入獄日記（二）〉，《台灣民報》2 卷 7 號（1924 年 4 月 21 日）。本稿筆者未見。

⁴ 渡辺京二，〈志士とはなにか〉，《評伝宮崎滔天》（東京：書肆心水，2006 年 3 月），頁 81。本文中引自日本文獻者之中譯，除非另加註明，其餘皆出自筆者，以下不再詳加註解。

狩了」。⁵可知蔣渭水將當時從事社會運動者比擬為維新志士，對「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視為宛如維新志士們在明治維新前後所從事的建國大業般。

宮崎八郎為自由民權先驅者，在牡丹社事件時隨西鄉從道征討台灣原住民，後死於西南戰役。在西南戰役中，宮崎八郎等自由民權分子多加入西鄉軍以早日促成自由民權的普及。⁶宮崎八郎的弟弟們，民藏、彌藏以及寅藏（滔天）則繼承其遺志以及其自由民權的理想，將其發揚光大成為支持孫文中華革命的亞細亞主義者。而蔣渭水所閱讀的《西鄉南洲傳》版本以及其內容其實正與西南戰役中的敗者，即宮崎八郎一系的自由民權運動有密切關係。

蔣渭水因「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被捕入獄時，正值大正十二至十三年間，為何明治維新時期思潮以及明治一〇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的記述會再現於蔣渭水此時的〈入獄日記〉呢？本文將由蔣渭水閱讀的《西鄉南洲傳》版本探究此文本與日本民權運動的關係，進而以蔣渭水書中所記錄的西南戰役中熊本協同隊為中心，探討以西鄉南洲主導的西南戰役前後宮崎八郎的動向與其自由民權主張，之後將進一步釐清大正一〇年代所出現的明治維新時期思潮和自由民權運動，以及二者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間的關係。

一、蔣渭水〈入獄日記〉中的《西鄉南洲傳》與自由民權運動

日本的近代化向來被認為由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改元明治元年的一八六八年開始。其實當時日本內部對「日本」如何近代化，如何成為近代國家，在明治初期還處於摸索期，大政奉還之後對佐幕派的武力掃蕩結束後，雖然暫時進入穩定期，但內部對於新國家的走向尚未達成共識。在外交問題上，明治初年主要有俄國人殺害樺太的日本居民、琉球漁民漂流至台灣遭原住民殺害事件以及對朝鮮的遣使等問題。與朝鮮的爭端，鑑於朝鮮對日本種種不友善態度，外

⁵ 《台灣民報》(1924年4月11日)，頁15。日文的「志士」與「獅子」為諧音。所謂「獅子狩」即為獵捕「志士」之意。

⁶ 西南戰役是明治維新之後攸關薩長政府能否穩固政權的決定性戰役。西南戰役當時的政府軍將領如熊本鎮台的兒玉源太郎、樺山資紀、乃木希典日後在新殖民地台灣分別擔任第四代、第一代以及第二代總督。從此事實可得知，西南戰役之後握有重兵的西鄉隆盛倒下後，軍事派系勢力的分據。

務省在一八七三年呈報太政官，日本認為有必要「糾正其無禮態度」，甚至不惜兵戎相見⁷。關於朝鮮遣使問題，西鄉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以及副島種臣等為對韓主戰派，但在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非主戰派以及三条、岩倉等大臣的主張下，則反對派遣西鄉隆盛為朝鮮使節，因為非主戰派認為對朝鮮派遣使者，將會引起戰端並損害日本國益。⁸之後主戰派在閣議的談判破裂，西鄉便掛冠歸去返回鹿兒島。而這也種下了維新之後新政府面臨的內部最大武力挑戰的遠因——明治十年（1877）西鄉隆盛所領軍蜂起的「西南戰役」。西鄉隆盛在明治維新史，向來被視為悲劇英雄，和在明治維新成功前夕被暗殺而倒下，但卻代表維新前夕中黎明象徵，成為日本青年所憧憬的坂本龍馬呈明顯的對比。但西鄉隆盛在一般庶民當中的人氣始終不衰，便是源於其「無私無慾的生活態度、極為豪爽俠義的天性、膽識以及決斷力」⁹的魅力。也因此日本的西鄉隆盛的傳記可說是汗牛充棟。

在日本民眾中流行的西鄉隆盛傳記，出現在蔣渭水的〈入獄日記〉，令人不禁聯想西南戰役之後對薩長政府執政不滿而風起雲湧的日本明治初期自由民權運動，與對於台灣總督府要求自治姿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二者之間產生關聯的可能性。蔣渭水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因「治警事件」銀鑰入獄後所記錄的讀書日記中，便每每提及《西鄉南洲傳》。在一九二三年的「治警事件」中，他被拘禁約有六十四天¹⁰。之後在《台灣民報》（1924年4月11日、21日，5月11日，6月1日、11日、21日，7月21日）發表了一連串的〈入獄日記〉。這也是他所留下來極少數的讀書日記，其紀錄當中包括了日本文學以及思想方面作品有《明治維新志士活躍史》（作者不詳，1924年4月11日）、《西鄉南洲傳》、幸德秋水《基督抹殺論》（1924年4月21日）、小栗風葉《麗子夫人》（1924年6月11日）以及《明治文化之研究》等。由此一讀書紀錄看來，可得知幾乎

⁷ 猪飼隆明，《西鄉隆盛—西南戦争への道—》（東京：岩波新書，2002年），頁124。

⁸ 猪飼隆明，《西鄉隆盛—西南戦争への道—》，頁124-178。

⁹ 猪飼隆明，《西鄉隆盛—西南戦争への道—》，頁11。

¹⁰ 蔣渭水，〈入獄日記·續〉（《台灣民報》2卷13號，1924年7月21日）為出獄當天的記述：「自昨年十二月十六日被檢舉至今天總共六十四天」，頁13。

所有的書籍都是明治時期流通的作品，但同時對於大正時期明治出版物的流行狀況，筆者認為有深入追究的必要。

由此讀書紀錄得知，他對於明治維新的志士活動相當關心，而在〈入獄日記〉當中所記錄的少數讀書日記卻一再提及《西鄉南洲傳》中參與西南戰役的熊本協同隊。節錄如下：

今天讀西鄉傳內有西南役，熊本城攻城戰的時候，有熊本志士，宮崎八郎（是對中華革命大盡力的宮崎滔天的兄弟）是當態〔熊〕本協同隊的幹部，他有一個愛人叫做浪子，那愛情很是濃厚如膠一般，每夜變裝男子到營內和其討趣，後來隊中有美人的風說很大，遂被查出，屢受同志諫止，宮崎口雖服從實際仍是難改，依然以大兵營作小戰場，那同志中，有一人發議善後策，為要救宮崎，除非暗殺浪子不可，遂計畫殺浪子的方法，夜及潛伏浪子所應經過的路徑，等待浪子一到要將一刀兩斷了，但是每夜必來的浪子，是夜竟連影都沒有看到，大家不解那理由，後來才知是有人聽見，秘密走去通知浪子，所以浪子不敢再來的。後來宮崎戰死，浪子聽知心神昏亂發狂自盡死了，云云，讀後不覺大叫痛快，高笑一番，幾不覺是在獄裡的，幸福看守沒有看見，顯些被譴責了。¹¹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月曜日（晴）寒

到過午西鄉南州¹²三卷二千五百頁已經讀破了，是二十二日一入獄裡，以來，日間概讀這書……終日都是和這維新志士，西鄉，勝海舟，大久保，木戶，江藤，板垣們會話，說到好處，幾忘卻身上在這蹣跚天躋地的獄裡，恍惚是在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的路上，幸有這諸位的好伴侶，每天接踵到這裡談天說地，如有應接不暇的勢面……。我所會見的人物當中，我很敬服勝海舟先生的人格和胆略，若是西鄉先生，雖不愧作明治維新的偉人，還是不及勝先生的，但他以作大將，據兵馬之權，作近衛都督還是陋衣粗食，蔽履單衣（沒有替換的外衣），則實在是凡人

¹¹ 《台灣民報》（1924年4月21日）。

¹² 西鄉南州（洲）即西鄉隆盛。

學不到的特點，卷中有熊本攻城中，少婦男裝到兵營尋情人作巫山之樂，和某志士在獄中蜜〔密〕藏其妻片影，中〔終〕日看影自樂的兩件事，可做我獄中的餘興。¹³

蔣渭水在入獄時，隨身攜帶的三套書中，包括了《明治維新志士活躍史》¹⁴。而同時入獄同志因無書可讀，便將書分送，只留得志士史。¹⁵《西鄉南洲傳》三冊則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家中寄至。由其紀錄當中可得知，蔣渭水一入獄立即閱讀《西鄉南洲傳》，而且在短短的九天當中，已讀完全書的二千五百頁，可知蔣渭水對於日本幕末維新史有著相當的關心。

蔣渭水的讀書日記中並未記錄此書作者，但西鄉隆盛的傳記，在其西南戰役之後，其實便有相當多的版本流傳。¹⁶但三冊的《西鄉南洲傳》便多達二千五百頁的版本，以及與蔣渭水的讀書筆記內容比對之下，除了伊藤痴遊（1867～1938）的版本之外，並無其他版本¹⁷。伊藤痴遊的版本與其它版本最大不同的特色便是其傳記內容以及敘述方式。在明治時期所出版的西鄉隆盛傳記，主題嚴肅，大多為彰顯西鄉的人格以及事蹟。所以並無有人物逸事穿插以及故事情節的鋪陳。由蔣渭水的讀書筆記得知，他所閱讀的《西鄉南洲傳》中敘述了宮崎八郎的情人浪子變裝為男子至軍營與八郎幽會的情節，相當於伊藤痴遊的《伊藤痴遊全集·第十六卷》〈西鄉南洲·續篇〉中〈城兵突破戰與協同隊情史〉四六〇至四六六頁的敘述。

伊藤痴遊的全集中收入《西鄉南洲傳》為第一卷的《西鄉南洲·前篇》，第二卷《西鄉南洲·後篇》，第十六卷《西鄉南洲·續篇》以及第十八卷的《西鄉南洲·終篇》。但由於《伊藤痴遊全集》三十卷在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三〇年由

¹³ 《台灣民報》（1924年5月11日）。

¹⁴ 《台灣民報》（1924年4月11日），頁15。

¹⁵ 同上註。

¹⁶ 關於西鄉隆盛的傳記，在西南戰役之後，大量出版，而多以政治小說的面貌問世。見柳田泉，〈政治小説の一般〉，《明治政治小説集（一）》（東京：筑摩書房，1966年），頁84。而在目前的日本國會圖書館明治時期出版的目錄中，同樣名為《西鄉南洲》者，有櫻庭經緯（乾外）（東亞堂書店，1891年）以及川崎三郎（川崎紫山）（春陽堂〔四版〕，1897年）等。此外，西鄉相關傳記，更不勝枚舉。

¹⁷ 相對於蔣渭水引用文中的原文部分為〈城兵突破戰と協同隊情史〉，《西鄉南洲·續篇》，《伊藤痴遊全集16》（東京：平凡社，1930年）頁447-466。

平凡社出版¹⁸，所以在時間上與蔣渭水的《入獄日記》成立時間不符。但再經仔細調查的結果，發現第十六卷《西鄉南洲·續篇》以及第十八卷的《西鄉南洲·終篇》是以在明治四十五年（1912）由東亞堂出版的《之後的西鄉南洲》（《後の西鄉南洲》）二卷為底本，刪減部分章節而成的。而蔣渭水二次提及的宮崎八郎與愛人浪子的逸聞則收入其中的第二卷與全集同一章名〈城兵突破戰與協同隊情史〉中。

然而《西鄉南洲·前篇》與《西鄉南洲·後篇》則未發現出版紀錄。而與部分內容相符的則是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所出版的《僧月照西鄉南洲·外篇》。在其序言當中，可得知在這之前伊藤已出版《西鄉南洲傳》以及外編《安政大獄》，而且希望讀者能夠一併閱讀。我們也可從中推斷蔣渭水所閱讀的《西鄉南洲傳》的版本應該可能屬於此時期的版本。但是此中的問題是，為何初版與全集的版本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大。這在一般的文學作品當中並不是多見的現象，但如果從作者伊藤痴遊的生平以及此作品的性質以及其成立過程來看，其實二者是有極大關係的。

伊藤痴遊在今天已不太為人所知了，但在戰前卻是大大的名人。伊藤痴遊本名為仁太郎，生於橫濱，是講談師，也是政治家。曾在第一次普選總選舉等選舉中當選二次的眾議院議員。伊藤自幼醉心自由民權運動，師事自由黨的實力派領袖星亨，於明治十四年（1881）加入自由黨，成為自由民權運動壯士到處演說。明治十七年（1884）因涉嫌加波山事件而為警視廳所拘捕，隔年明治十八年（1885）四月在名古屋違反遊行集會條例，被拘禁四個月，之後，因靜岡國事犯事件、秘密出版事件以及違反選舉法而常遭逮捕與拘禁¹⁹。這和蔣渭水在從事社會運動時常遭警察跟蹤逮捕的境遇相同。²⁰

¹⁸ 伊藤痴遊的著作除了在1920-1930年間由平凡社出版了30卷的《伊藤痴遊全集》之外，在此之前便已出版了三十餘冊的著作。見二木一夫，〈社会人一年生——伊藤痴遊とその仲間〉，《高野房太郎とその時代》。網頁版：<http://oohara.mt.tama.hosei.ac.jp/nk/takanoden19.html>。

¹⁹ 同上註，以及〈伊藤仁太郎年譜〉，《痴遊雜誌》4卷11號（1938年）。

²⁰ 蔣渭水女兒蔣碧玉回憶父親在從事社會運動時：「父親和他的同志們時常晚上去演講，但到半夜卻是另一批人回來給他們拿衣服，說是又被日本鬼子給捉去了，這種事家常便飯。」蔣朝根著，王曉波編，〈文學的蔣渭水，革命的蔣渭水〉，《蔣渭水全集·下》（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

他也是知名的講談師。双木社痴遊為他的號。所謂的講談，與中國的說書近似。明治初期的庶民娛樂，如歌謠、講談、浪花節等和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其實有極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板垣退助所創立的高知的立志社，其所主導的明治一〇年代的自由民權主張，第一為民選議會的開設，第二則是撤除與歐美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保國家主權。其中心人物植木知盛在明治十二年所寫的《民權自由論》更進一步指出，確立人民的自主、自由的權利對於國家獨立或是國權的伸張是不可或缺的。為了普及這樣的民權國家主義於當時的四民，自由民權運動家利用上述的庶民娛樂普及其思想是處處可見的。²¹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蓬勃發展，政府開始對於集會條例擴大解釋，對於言論箝制更加強化。在明治十五年六月改正，追加集會條例，將所有的集會都視為政治集會。由於對於演說集會的加強取締，自由民權運動中的自由黨黨首板垣退助便建議口齒伶俐的自由黨員取得講談師牌照成為職業講談師，以便宣傳自由民權思想。這時期聽從板垣的勸告開始自由講談的有奧宮健之（藝名：先醒堂覺明）²²、伊藤仁太郎（藝名：双木社痴遊），而在阪神地方以自由黨辯士知名的川上音二郎也在明治十八年（1885）取得講談師牌照（藝名：自由亭雪梅）²³。

而伊藤痴遊所發明的「政治講談」內容以偉人傳、同時代人物評論、政治內幕而深獲大眾喜愛。其中偉人傳中又以《西鄉南洲傳》最為知名，而他講談內容的速記本也連續不停地出版，所以講談內容與自行撰寫的作品內容有差距或有重複現象，在伊藤的作品集中應是時有所見。例如，他在《僧月照·西鄉南洲外編》（東亞堂書房，1911年）的序言當中提及：「本篇改編自舊稿，不是速記本。特此聲明」。而伊藤痴遊作品中講談本以及創作本並立的現象，也能夠為上述《西鄉南洲傳》的版本差異作出極合理的解釋。所以足見這個版本流行其實正是日本倡導自由民權運動之下的產物，而在當時板垣退助等自由民權運

²¹ 兵藤裕巳，《演じられた近代》（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頁72。

²² 其藝名先醒堂覺明（senseidō kakumei）的先醒與覺明和專制（sensei）以及革命（kakumei）二者諧音。奧宮健之自明治15年（1882）10月起，開始了以擁護人力車夫生活為目的的政談會。同上註，頁82-83。

²³ 伊藤痴遊，〈国会開設政黨秘話〉，《伊藤痴遊全集15》（東京：平凡社，1930年）。以及兵藤裕巳，《演じられた近代》，頁295。

動者的主要訴求正是促進日本國會的設置，而板垣退助所創立的立志社所主導的愛國社在明治十三年三月改名為「國會開設期成同盟」，名稱的雷同，令人聯想與蔣渭水等所倡導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訴求。

這股大正時期的明治期思潮復古，究竟為何而來呢？蔣渭水的讀書紀錄其實透露當時明治思潮在此大正十年間流行的訊息：「明治文化之研究」。明治文化之研究其實是由大正時期「民本主義」主導者吉野作造在大正十年開始著手研究。吉野作造為蔡培火等在大正九年（1920）所創刊的《台灣青年》寫了〈《台灣青年》發刊祝辭〉，之後與台灣留日學生便有所接觸往來，而他在此時期正開始提倡「明治文化研究」。根據吉野的〈矢志研究明治文化之動機〉（1926）中提及「大正七、八年的今日談論民主如何，共產主義如何，其基本的政治思想的混亂便宛如明治十年左右」²⁴。而也因為如此，為了解當時政治渾沌狀況，吉野認為有必要釐清明治時期的歷史脈絡。此中吉野認為自己的明治文化研究「能讓漫罵老人集團頑迷的年輕人了解其所攻擊者之偏頗言論所產生的時代背景之必要，並且警告他們改正時注意時代推移的必要性」時會有所助益。²⁵而當時新聞媒體所掀起的明治文化研究熱，從吉野下列的敘述便可窺見一二：「現今明治文化研究頗為盛行，新聞雜誌當中所連載的通俗讀物以明治初年的逸事奇聞居多。雖然令人欣喜，但其中誤謬甚多的說明令人不知如何以對」²⁶。如果對照吉野這一番話，不但能得知日本媒體當時高漲的明治維新思潮的復古熱，如果反觀當時《台灣日日新報》的書籍廣告當中，也能夠發現此時期有關明治時期的讀物在台灣也廣為流行。例如大正十二年（1923）十二月十八日《講談文庫》新年創刊號的廣告可見多連載以明治期為背景的小說，而大正十二年（1923）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全幅版面刊登新年號的講談雜誌《講談俱樂部》的廣告，可知雜誌故事內容多以幕末明治期的任俠小說或勤王志士為主題。而其中伊藤痴遊的政治講談〈森有禮之死〉也赫然在其中，敘述明治立憲前後的故

²⁴ 吉野作造，〈明治文化の研究に志せし動機〉，《新舊時代》（1926年4月），收錄於《吉野作造選集11》（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102。

²⁵ 同上註，頁105。

²⁶ 吉野作造，〈明治維新の解釈〉，《婦人公論》（1927年12月），收錄於《吉野作造選集11》，頁216。

事。由此推知蔣渭水在此時期偏好閱讀明治維新志士史，與當時日本本土的明治維新思潮復古熱，其實是一種共時性的文化現象，而這股文化現象正與大正「民本主義」有著緊密的連結。這股明治思潮復古熱，對於大正時期追溯自由民權運動的起源以及擴散有著一定的推波助瀾之功。接下來我們將回到蔣渭水在日記當中再三提及的「宮崎八郎」，他正是日本民權運動的先驅，也是日後影響弟弟們宮崎彌藏以及滔天（寅藏）在亞洲協助孫文從事中華革命的動力源頭。

二、自由民權運動先驅·宮崎八郎征台之役前後始末與西南戰役

蔣渭水在《西鄉南洲傳》約二千五百頁的大作中，為何對於西南戰役中協同隊的宮崎八郎矚目呢？宮崎八郎到底何許人也？其實西南戰役、熊本協同隊以及宮崎八郎都與自由民權運動有著極密切的關係。西南戰役起因，雖然在於不平士族對於維新政府的武力起義，但如果細究蜂起軍隊的各種訴求，便會發現加入西鄉軍的士族部隊的原因各有所為。除此之外，與台灣問題以及征韓問題也有極密切的關係。此外，蔣渭水所提到的宮崎滔天，其後協助孫文以及中國革命的根源，其實正承襲了宮崎八郎的自由民權運動。所以蔣渭水在〈入獄日記〉當中所提及熊本協同隊以及宮崎八郎並非偶然。從明治維新黎明到隨同西鄉從道出兵台灣，最後於西南戰役戰死，宮崎八郎的人生與明治維新之後，近代日本在摸索其出路的軌跡是重疊的。宮崎八郎出身熊本縣玉名郡荒尾村，世代為荒尾村鄉士一系，父親長藏是二天一流的著名劍客²⁷，是宮崎長藏的長男，也是後來輔佐孫文革命的彌藏、民藏以及寅藏的長兄。明治三年（1869），年二十歲時，奉藩命上京遊學。當時佐幕勢力以五稜郭為最後據點的抵抗已經為新政府軍所剿平，但是維新政府勢力仍然薄弱，外有與庫頁島（樺太）國境糾紛問題，與他國間需交涉問題堆積如山，內有長州奇兵隊脫隊士兵反亂，政府忙於善後。此時西鄉隆盛獨自回到鹿兒島進行下級武士以及藩政的改革，開

²⁷ 渡辺京二，〈略年譜〉，《評伝宮崎滔天》，頁 374-377。

明派者對於西鄉的去留問題心中已有疑問。當年四月四日給父親的家書當中，可看出八郎對於當時日本立國成功與否抱有極大的危機感：

朝廷政體未能政通人和一事，雖有其大義名分，但實效不彰，如果依舊一成不變的話，便難以建立〔獨立〕基礎……外交一事上，朝廷事實上組織能力薄弱，夷人所主張之事，無有能拒絕者，唯有感嘆受其欺侮之勢每日俱增。²⁸

上村指出在此階段，幕末以來宮崎八郎的尊王攘夷思想已漸漸蛻變轉向國家主義，明治五年（1873）琉球漁民遭台灣原住民殺害的牡丹社事件發生時，宮崎八郎與之後西南戰役協同隊副隊長有馬源內上「征台論」之建白書。而期間屢屢穿梭「西鄉板垣江藤前原」等征韓陣營門前，在明治六年（1874）征韓論決裂，西鄉等征韓派五參議下野之後，因而在隔年激憤上書。²⁹極力主張征韓以及於明治七年實際參與西鄉從道的征台戰役，其實便源於其主張日本外交應該以武力行動伸張國權的想法出發。征韓論的破裂³⁰，使西鄉隆盛自身對於新政府的腐敗以及憤怒達到極點，以致掛冠返鄉。而在近代化的巨輪下，一步步被逼上絕路的舊士族將西鄉的掛冠求去視為維新理想的消滅。也因此明治政府之後企圖以征台以及出兵江華島來解消內部士族不滿以及內部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勢。

明治七年以蕃地處分為大義名分的征台之役，決定由西鄉從道擔任台灣蕃地事務都督並將其由陸軍少將升任為陸軍中將，並由其徵集部隊，其征台兵員

²⁸ 原文為：「朝廷の政体不折合にて名分は大に明に有之候様に御座候へども、実功は一向相立不申、只今通にて御座候はば逆も今一変不任ては難叶力と奉存候……外国交際的一条は、朝廷も実に足腰も不立の勢、夷人の申す事に御座候へば如何様成事にてても拒絶ハ出来不申、日に増し彼が侮りを受る斗の事にて嘆敷事に御座候。」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傳・日本篇上》（福岡：葦書房，1995年），頁48。

²⁹ 由其建白書中可知宮崎八郎在此時改名為宮崎真鄉。同上註，頁63、頁70-77。

³⁰ 征韓論的破裂，眾說紛紜，明治維新之後的「有司專制」官僚體制的形成，導致政體內部深刻對立，而圍繞征韓論雖然分別源自內治派以及主戰派的政爭，但其源頭也正來自「有司專制」的權力構造偏頗因而造成的內部腐敗。豬飼隆明，《西鄉隆盛——西南戰爭への道——》，頁48-121。

以西鄉隆盛在鹿兒島所募集的志願兵因征韓論破裂而歸鄉者居多³¹，由上述可知牡丹社事件所引發的征台之役實為轉移征韓論焦點以及對西鄉隆盛安撫的手段之一。³²而宮崎八郎與有馬源內也參加了志願兵，本想利用募兵之名召集志同道合之士，但時間倉卒並未能如願。但此次征台五十一名熊本義勇兵中，後來有十三名加入熊本協同隊參加西南戰役，也就是說八郎在此次征台之役中獲得了之後生死與共的盟友。

征台之役進行中，清國遣來使者，所以大久保利通急赴北京等地交涉。伸張國權激進派八郎一派覺得交涉勢必極為花費時日，因而向西鄉從道進言，意圖與平川唯一渡過對岸的福建省以勘查清國的形勢，但西鄉當然對於激進派的建議沒有採納，而八郎也因感染瘧疾而中止此計畫。征台之役對八郎而言並未達成其所希冀的「發揚國威」目的，此外失去戰友以及身染重病的狀況，由其當時題為〈台灣征軍〉的詩作可窺見當時其抑鬱的心情：

國家大計動誤機，天下向誰論是非，萬里風濤遠征客，空將暗淚灑戎衣。³³

關於此時期的宮崎八郎的文獻缺乏，但其後組織植木學校，摸索自由民權等過程的事實推察得知，征台之役的不如意以及征台期間愛弟伴藏去世，返日之後經過長久的養病期間之後，宮崎八郎已漸漸從征韓論的狂熱分子轉型，加上受板垣等民權思想影響，轉變為激進民權派論者。此外，他對於西鄉隆盛一面倒的反政府運動也保持一定的距離，而是與同志們在熊本組織一學習運動而開創了植木學校。蔣渭水所閱讀的，也就是伊藤痴遊所著的《西鄉南洲傳》對於以宮崎八郎為首的協同隊員在西南戰役之前如何加入西鄉從道出兵台灣，一直到成立植木學校宣傳民權運動等經過有極深刻的描寫。我們不要忘記伊藤的

³¹ 西鄉都督と樺山都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會，《西鄉都督と樺山都督》（台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頁7-9。

³² 西鄉從道之子——西鄉從德後年提起關於出征台灣的軍隊，是駐紮長崎的西鄉從道託付兄長西鄉隆盛由鹿兒島募兵，出發時，西鄉隆盛親自送行並給予訓示。西鄉從德，〈銀の腕輪とキニ一ネ〉，西鄉都督と樺山都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會，《西鄉都督と樺山都督》（台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頁80。

³³ 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傳·日本篇上》，頁86。

《西鄉南洲傳》原本是以政治講談的形式進行講述，主要意在宣傳自由民權，所以對於初期自由民權志士的活躍特別加以著墨。

伊藤敘述宮崎八郎回歸故鄉熊本縣玉名郡荒尾村，與熊本縣令土佐人安岡良亮相識相知。安岡雖貴為縣令，但思想開明，對宮崎等自由民權激進派推心置腹，後來在安岡的協助下，創立植木學校推行自由民權思想。其學科除漢籍之外，西方政治學書籍，如米爾的自由之理，萬國公法等也是必讀的。宮崎更因上東京採買教科書進而成為中江篤介（兆民）的知交。在民約論的影響之下，明治八年（1875），宮崎已開始注意到自治的重要，而主張村民代表的戶長應由民選。透過縣令安岡的奔走，調查了民會制度以及國外的前例之後，照著宮崎等的希望，成立了縣會以及區會，以投票方式選出人民代表，參與縣政以及區政。在當時日本全國當中，只有熊本縣實行。在這一點，安岡良亮以及宮崎八郎身為民會的最初實行者，在民權史上是值得記上一筆的。³⁴

明治十年，西鄉隆盛決定舉兵，宮崎八郎決定組織協同隊，加入戰局。維新戰爭時期，「勝者官軍，敗者賊軍」口號流行一時，老弱婦孺皆能琅琅上口，宮崎八郎等熟知明治政府好不容易建立在馬基維利式政權上的骨架岌岌可危，所以他認為日本立國方針應按照自己與同志的理想進行，即對外國列強堂堂宣揚主權，而對內須伸張所有人民天賦權利。這樣的開明政府才有可能增長明治皇室的威信。³⁵從宮崎八郎所在的協同隊發給西鄉隆盛的〈協同隊舉兵趣旨〉便能得知其主張：

明治六年以來，政府失政，奸吏竊位，賞罰出自愛憎，政令放任姑息，苟且偷安，對外國際權益盡失，國內呈末世徵候。……我輩多年宿志此時不伸尚待何時？即冀望同心協力斷然推翻暴政政府，對內確立不拔千歲國體，對外恢復對峙萬國權益，共同確保全國人民真正幸福，此乃我輩宿志，我輩義務。³⁶

³⁴ 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傳·日本篇上》，頁 354。

³⁵ 同上註，頁 161。

³⁶ 同註 34，頁 208-209。原文如下：「明治六年以來、政府政ヲ失シ、奸吏位ヲ窃ミ、賞罰

蔣渭水提到的協同隊亦在伊藤痴遊的書中占有極重要的篇幅。在第十六卷《西鄉南洲·續篇》中關於西南戰役的描寫便有〈熊本協同隊的崛起與諸士的奇行〉、〈協同隊的奮鬥〉以及〈城兵的攻破戰與協同隊情史〉三章。關於協同隊的成立、成員以及目的，書中描述如下：

在攻城戰開始時，這一隊已是特別地大放異彩了。民權自由的主導者聚集在這一團更是令人覺得特別饒富趣味。協同隊的前輩們多為民權自由的主導者這點不僅與其他軍隊不同也是協同隊的特色。有馬源內，平川唯一，高田露……宮崎八郎等人率先組織一團義勇軍，取名協同隊。……因此隊中的前輩們對盧梭的民約論產生共鳴進而奉行自由民權主義，與當時的政府意見相左一事也不遑多論的了。但與西鄉黨的主張也是完全無法相容的。為了反對政府，所以先投入薩軍打倒政府。即使西鄉黨政府興起，這一軍團仍然是反對的。³⁷

由以上描述中足見協同隊一團雖然加入西南戰役，但與西鄉隆盛意圖回復因置藩廢縣、徵兵制以及秩祿處分所被剝奪的士族特權的目的大相逕庭。但在當時西南戰役，無論是加入政府軍或是西鄉軍，並不全然是因為贊成政府或西鄉軍的政治主張，其實各有所為，同床異夢者大有人在。³⁸

宮崎八郎據說明治十年於熊本縣八代附近戰死，消息傳回故鄉荒尾村，父親長藏精神狂亂，「痛哭失聲，聚集於庭院的家人發誓一生決不（於明治政府）仕官」³⁹。明治維新戊辰戰爭佐幕的會津藩被視為賊軍，而在西南戰役一役之

ハ愛憎ニ出デ、政令ハ姑息ヲ究メ、苟且儉安、外国際ノ權利ヲ失シ、内末世ノ兆候ヲ呈ス。……我輩多年ノ宿志ヲ遂グル此時ニ非ズシテ何ゾ。乃チ同心協力断然暴政府ヲ覆シ、内ハ千歳不拔ノ国体ヲ確立シ、外ハ万国対峙ノ權利ヲ回復シ、全国人民ト共ニ真成ノ幸福ヲ保タント欲ス。是我輩ノ素志ナリ、我輩ノ義務ナリ」。

³⁷ 伊藤痴遊，《伊藤痴遊全集 16》，頁 304-305。

³⁸ 例如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作者柴四朗（東海散士）為會津藩出身，戊辰戰爭時，二哥戰死，而家中女性們，祖母、母親、兄嫂以及姊妹等五人自盡。在西南戰役時，與弟弟五郎為洗刷戊辰戰爭時〈叛軍〉會津之辱，轉而成為戊辰戰爭時最大敵藩政府軍的臨時將校為其效命。山口昌男，《「敗者」の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頁 180-182。

³⁹ 渡辺京二，《評伝宮崎滔天》，頁 52。此處文獻源自《荒尾史話》第 3 卷，頁 108。參照同書註腳 5。

後，宮崎一族在某種意義上，與會津藩等佐幕派等同地被貼上賊軍的標誌，成為明治政府謀反者的家系⁴⁰。

三、從自由民權到亞細亞主義——宮崎滔天與自由民權運動的實踐與擴散

蔣渭水再三提起的宮崎八郎其兄弟四人都為自由民權運動奔走，其中宮崎彌藏為中國革命奔走，第一次革命失敗後，由中國返日，在橫濱蟄伏期間病逝。而最小的弟弟寅藏，也就是滔天，以對孫文的輔佐以及中國革命貢獻而知名。一家兄弟成為革命志士其實不僅來自於自由民權運動的影響，西南戰役中陣亡的長兄宮崎八郎對其弟弟們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宮崎滔天在宮崎八郎戰死時，年僅七歲，民藏、彌藏等兄長均承襲八郎遺志，將其一生奉獻給日本明治政府以外的國家，將自己在明治政府國境中未竟的國家理想推展到亞洲諸國。宮崎兄弟所實踐的「亞細亞主義」其實正是承襲宮崎八郎未竟的遺志。在其自傳《三十三年之夢》當中，滔天如此回憶這位早逝的長兄並提及其逝後對自己的影響：

我的親友以及村中的老先生以及老太太們總是極力慫恿我向大哥看齊。這個大哥便是在明治初年主張自由民權論四方漂泊，在（明治）十年時參與西鄉之亂戰死的。但我此時尚不知何謂大將豪傑，卻希望成為大將豪傑，也未知如何為自由民權，只覺得自由民權是好事，而官兵，官員等有官字的人都如同小偷惡人。而賊軍或叛亂全都是大將豪傑所應做的事。……我上附近村莊小學時，在習字以及作文課時濫用自由民權等字句，幾度遭教師譴責，但我是天生的自由民權家，並不是教師的譴責便得以矯正的毛病。十五歲那年，小學畢業進入中學以後，屢屢上演同一

⁴⁰ 會津藩在西南戰役當中加入政府軍，對西鄉在大政奉還時，征伐會津藩一事報一矢之仇。參照本文註 38。

狂態，經常遭校長以及教員的譴責，特別是同窗對我疏遠嫌惡，曾不止再三地遭受夜襲攻擊。⁴¹

由滔天自述當中可得知，家鄉父老對於宮崎八郎視為自由民權鬥士，鄉里的英雄，其後其兄弟們承襲這位兄長未竟的遺志是想當然的結果。承襲自由民權思想的同時，明治政府謀反一族的烙印已經深深落在幼小的滔天身上。自幼對於自由民權已耳濡目染，當時受同窗乃至師長排擠的記述，可知當時謀反者遺族在明治十年西南戰役之後的艱難處境。

滔天在傳記《三十三年之夢》中，提到他決定後半生獻身中華革命的契機：在故里當地所參與的民權運動遭受挫敗後，與二哥彌藏一夜長談，解析天下形勢，以及此後兄弟該如何實踐理想。這一席談話當中，彌藏鑑於世界形勢，擔憂野蠻暴力對人道的蹂躪，掠奪民權之日來臨，而認為保衛擁護其者唯獨依靠腕力，無論是進而落實人道於全世界或是退而擁護人權，都需要腕力基礎而這正成為當務之急⁴²。而他所依託能實踐其理想的，則是振興中國，以新生的中國為基礎出發。彌藏論道：

希望能共同賭上一生進入支那內地，傳承思想至百世紀，成為真正支那人，延攬英雄，奠定繼天立極之基，如果中國復興則義理立，印度興則暹羅、安南振起，也應能拯救菲律賓、印度。……普遍恢復人權、於宇宙建立新紀元方策，除此之外別無他法。⁴³

⁴¹ 宮崎滔天，《宮崎滔天・三十三年の夢》（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8年），頁21-23。原文如下：「余が親類縁者や、村中の老爺、老婆等は、皆言を極めて兄様のようになりなさいと煽りたり、兄様とは、明治の初年に自由民権論を主張して四方に漂浪し、十年西郷の乱に与して戦死したる余が長兄の事なり、されば余は、未だ大将豪傑の何者なるや知らずして、大将豪傑たらんことを望み、未だ自由民権の何者たるを知らずして、自由民権を善き事と思ひ、また官軍や官員や、総て官のつく人間は泥棒悪人の類にして、賊軍とか謀叛とかいうことは、総て大将豪傑のなすべき事と心得居たり……余は近村の小学校に通学しけるが、習字、作文の課業に自由民権の字を濫用して、幾度か教師の譴責を受けたり、しかれども余や先天的自由民権家なり、教師の譴責によつて匡正せらるべき病癩にあらず、十五の年、小学校を卒えて中学に入りし後も、同一なる狂態を演じてしばしば校長、教員の譴責に逢ひ、殊に深く同窓生に疎悪せられて、夜襲も蒙らんとしたることも再三のみならざりき。」

⁴² 同上註，頁60。

⁴³ 同註41，頁61。原文如下：「願くば共に一生を賭して支那内地に進入し、思想を百世

以上的記述，可知宮崎八郎的自由民權主張，在宮崎滔天兄弟發展以及實踐下形成為亞細亞主義的支流，三兄弟終其一生為中華革命盡力而東奔西跑，特別是滔天，被喻為「孫文最信賴的日本人」。宮崎八郎這位兄長以及他在故鄉所開啟的自由民權思想對於宮崎滔天後年投身中國革命輔佐孫文的影響其實不容忽視。蔣渭水在同一〈入獄日記〉中也以隱喻的手法表達對孫文的敬意：

一月二日 水曜日 在這獄中我終日戀戀不能捨離的，最愛的，就是太陽君。那太陽君是驕傲，高貴，……只是青天白日的時節，才肯到這裡和我作伴的。⁴⁴

宮崎八郎在〈入獄日記〉屢次出現，或許可視作對宮崎滔天與中國革命以及孫文之間關係的隱喻。而滔天與孫文的關係，也許因此使得尊崇孫文的蔣渭水對滔天矚目。關於宮崎滔天與孫文中華革命關係，就如前述中提及的，在大正期開始明治文化研究風潮的吉野作造在〈日本人的革命援助〉⁴⁵當中有著詳述，而吉野也正是在大正民主運動時期為宮崎滔天復權者。之後在大正十五年由吉野主導的明治文化研究會出版了吉野作造所編輯的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⁴⁶。吉野作造在大正時期所主導的明治文化研究會所開始的「明治文化研究」運動⁴⁷，其中主要的成果之一便是對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運動再評價。

大正時期的「デモクラシー」思潮中，吉野作造對於宮崎滔天的這一波亞細亞主義的起源以及作用，在其開始從事中國革命史研究後的第一本著作《支那革命小史》中，對中華革命初期中日雙方的關係有著詳細敘述⁴⁸。其後在其

紀にし心を支那人にして、英雄を收攬してもつて繼天立極の基を定めん、もし支那にして復興して義に頼て立たんか、印度興すべく、暹羅安南振起すべく、比律賓、埃及もつて救うえきなり、……懇うに遍く人權を恢復して、宇宙に新紀元を建立するの方策、この以外に求むべからざるなりと。」

⁴⁴ 《台灣民報》(1924年5月11日)，頁12。黃煌雄以及林瑞明都曾提及太陽君、青天白日影射中國國民黨以及孫中山。見林瑞明，〈感慨悲歌皆為鯤島——蔣渭水與台灣文學〉，《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2001年)，頁211。以及同書中註19。

⁴⁵ 吉野作造，〈日本人的革命援助〉，《對支問題》，《吉野作造選集7》(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⁴⁶ 吉野作造，〈日清戰後一部識者の對支活動〉，《對支問題》，《吉野作造選集7》。

⁴⁷ 山口昌男，〈「敗者」の精神史〉，頁315-379。

⁴⁸ 狹間直樹，〈吉野作造と中国——吉野の中国革命史と日中關係史について〉，《吉野作造

著作《對支問題》當中，提及其研究目的為希望透過認識中國辛亥革命前後的歷史，「彼此國民之間能建立正常關係」⁴⁹。這番論述在蔣渭水創立文化協會組織動機的敘述中也可窺見：「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題，亞細亞民族聯盟，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所以我台灣人有媒介日華親善，以策進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動機……」⁵⁰。綜合前面分析與這番話，可看出「亞細亞主義」在當時大正時期為思潮主流之一，而蔣渭水等則試圖希望從這個論述當中為當時台灣人的處境開拓一條道路。

四、小結

明治六年征韓論破裂被迫辭職，因而下野的五參議之一板垣退助在鄉里土佐興起立志社，對其而言，明治十年西南戰役的敗北，正是悟出了反政府運動是無法以武力解決，而必須倚靠言論不可的道理，因此影響了自由民權運動道路的方向。西南戰役之後，自由民權運動更如火如荼地展開，西南戰役後第二年的明治十一年九月，在大阪舉行愛國社再起大會。明治二〇年之後成為日本右翼國粹主義運動主導者，玄洋社的創設人頭山滿也以福岡縣代表身分出席。之後，同年五月至九月，造訪高知的立志社。此時高知的立志社聚集了來自全國的民權派運動家（壯士），而頭山滿也藉此機會與各地壯士交遊。頭山滿自高知回到福岡的第二年，成立自由民權運動的政治結社向陽社，之後再改名成為玄洋社。之後，福岡縣內的民權運動整合組織筑前共愛公眾會成立，並在明治十三年（1880）一月率先向元老院提出國會開設請願書。而在同年三月，立志社所主導的愛國社改名為「國會開設期成同盟」，在四月向政府提出了國會

選集 7》，提及此研究在第三革命之後，為頭山滿以及宮崎滔天等所託，為宣揚孫文革命「真精神」而開始。雖然如此，吉野將日本帝國對中國侵略野心的理由正當化可由其對 1915 年二十一條款事件的主張看出。

⁴⁹ 《吉野作造選集 7》，頁 417。

⁵⁰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1925 年 8 月），頁 45。

開設請願書。⁵¹明治十四年自由黨創立，推舉板垣退助為自由黨黨首。第二年大隈重信組織立憲改進黨。⁵²

如果將西南戰役前後的自由民權運動的歷史與蔣渭水在一九二三年因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入獄為止的經過對照，會發現其中政治訴求手段轉變的過程是有相似之處的。同樣是在大規模的武力對抗——日本的西南戰役以及台灣的西來庵事件之後，所形成的言論對抗運動。此外，運動的主要訴求是以國（議）會的設立，雖然二者在時空以及政治條件大相逕庭，同時政治訴求也完全迥異。

在一九一三年，在台灣自治議會請願運動主導者林獻堂在東京訪問當時的內務大臣原敬未果，轉而拜訪板垣退助，陳述台灣總督府壓迫台灣的事實因而得到板垣退助的同情。板垣在第二年的一九一四年視察台灣之後，倡導設立台灣同化會以謀求本國與台灣的融合。板垣也替林獻堂斡旋，因而得到大隈重信以及東鄉平八郎的支持而得以成立台灣同化會。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正式成立，立刻有三千人加入。當然另一方面，台灣的內地殖民者也大肆反對。當時的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在與板垣面談的當時，雖然表面上贊成，但在板垣離台之後便以疑似大陸浪人者使同化會經營紊亂而將理事予以逮捕。一九一五年則以妨礙公安為由強迫同化會解散。同化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便煙消雲散。⁵³在前述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立前史中，我們可發現台灣在尋求言論以代替武力的過程當中與自由民權運動在尋求國會開設過程有極為相似之處，而蔣渭水等也承繼初期的自由民權運動家的國會請願政治結社——國會開設期成同盟的名稱，將議會設置請願的政治結社命名為「台灣議會期成同盟」。而明治初期自由民權運動的主導者板垣退助在台灣同化會的成立時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應與其在自由民權運動時期與明治政府對抗的經驗有關，雖然時空轉圜，板垣的自由民權運動精神已不復在。

之後，台灣正式展開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為第一次，一九二二年二月為第二次。第二次請願運動之後，總督府開始採取行動予

⁵¹ 兵藤裕巳，《演じられた近代》，頁 78-79。

⁵² 榛葉英治，《板垣退助—自由民權の夢と敗北》，頁 89-90。

⁵³ 小熊英二，《『異身同体』の夢》（《日本人の境界》）（東京：新曜社，2003 年），頁 320-325。

以壓制，參與者開始有了政治結社的主張以應付總督府的壓迫。一九二三年一月，蔡培火以及蔣渭水等人成立了以促進台灣議會設置為目的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該社隨即被總督田健治郎以違反治安警察法而遭禁止。同年二月七日，蔡培火、蔣渭水以及陳逢源三人攜帶第三回請願書赴東京請願，並在同年同月二十一日在東京的台灣雜誌社重新組織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而台灣總督府決心大舉整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對全島的議會請願運動分子進行搜查與逮捕，為知名的「治警事件」。⁵⁴

之後蔣渭水被捕入獄，我們從其〈入獄日記〉的讀書紀錄所出現的大正期的明治維新思潮復古的文化現象已經在前述中詳細分析，也因此得知這些明治維新以及自由民權運動的文化記號與大正民主運動息息相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運動的基本架構便是新舊思潮的對抗，而明治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回溯明治釐清新舊思潮根源。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蔣渭水在法庭辯論當中也屢屢以明治維新中「志士」對「幕臣」或是「鎖國論」對「開國論」的二元對立比喻新舊衝突的論述，來支持總督府與台灣人對於議會設置一事認識差距的自我主張。對於議會設置請願的性質，三好檢察官以領台當初台灣叛亂不斷如明治四十年的「苗栗事件」或「西來庵事件」來比擬⁵⁵。對此，蔣渭水在法庭答辯之時，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國內政爭的情況再度成為他論證的根據，他對於檢察官的論告視為是警務局長以及台灣總督的論告，「完全是新舊思想的衝突，恰像德川幕府末期的鎖國論者，勤王論者對佐幕論者的論戰似的」⁵⁶。並將三好檢察官比擬為「錯誤的忠君愛國」、「對新進的愛國志士加以一網打盡」的「井伊直弼」大老。對於檢察官的控告，認為「若做十九世紀以前的講古來聽，或者有了多少價值，若做大正的世代，在神聖的法庭的論告，我們覺得很意外的事」⁵⁷。

⁵⁴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1989年），頁81-83。

⁵⁵ 高日文，〈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法庭辯論經過（一）——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史稿之三〉，《台灣文獻》17卷1期（1966年3月），頁86-87。

⁵⁶ 同上註，頁106。以下蔣渭水答辯引用文皆同此出處。

⁵⁷ 參見高日文，〈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法庭辯論經過（一）——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史稿之三〉。

蔣渭水的這番答辯清楚呈現大正時期當代以明治維新政治情勢為例比擬「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運動中「新舊勢力」衝突對峙的構圖。特別是前述最後一段話中，顯然地凸顯了蔣渭水受「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所代表的改革新風潮的深刻影響，以及此股風潮對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所起的作用。蔣渭水在此答辯中所重新聲明的思想立場主張：「以中華民族作日本國民的台灣人，應具有做日華親善的楔子的使命。依台灣人行使這使命，東洋和平才能確保，世界人類幸福才能完成」——這一段話也反映了「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運動的流行論述，由自由民權運動所擴散的亞細亞主義的底流。